

再 版

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

許 行著



開拓出版社出版

再版

許行評論集之一

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

許 行 著

開拓出版社出版

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

作者：許 行

出版者：開拓出版社

九龍中央郵局郵政信箱72910號

排 字：鄧氏兄弟資料研究出版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頓道28-34號莊士敦大樓七樓C室

承 印：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16樓A4

總經銷：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

凱旋工商中心八樓C座

電話：3-645529 3-647565

1985年10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1987年10月再版

Xu Xing

**PROBING INTO CHINA'S ECONOMIC REFORM
1975—1985**

Published by **PIONEER PUBLISHERS**, P. O. Box 72910,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Copyright by **Xu Xing**.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October, 1985
and second edition in October, 1987.

許行評論集：

之一 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

再版
定價HK \$ 30

探討中國當前經濟改革已走的道路和未來的去向。

之二 改革期的中國政治

再版
定價HK \$ 30

討論官僚政治的形成、共產黨腐化的根源，以及人道主義、異化論、文官制度等諸問題。

之三 毛澤東神權時代

定價HK \$ 35

本書反映毛澤東神權暮年時代一切古怪的政治權術。

之四 鄧小平開放時代

定價HK \$ 35

鄧小平的開放帶來市場經濟的活躍和新思潮的湧現，但又受到「四個堅持」和反自由化的限制。本書闡述其中矛盾。

中國的薩哈羅夫方勵之

許行編
定價HK \$ 35

本書收集方勵之的本人講話以及中、港、台和海外介紹他的第一手資料，並附官方批判文章。

田園書屋出版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56號2樓

電話：3-858031 3-7801908

自序

文章發表在報紙上，流傳較廣，但壽命短促，因為它難於保存；文章發表在刊物上，流傳的範圍比報紙窄，易於保存，但不集中。要既集中而又易於保存的辦法，就是將它們編輯成書。

1. 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

我不是以寫作爲專業的人，祇因關心國家、關心世界，常常喜歡「舞文弄墨」，發爲議論，分別以國雄、古熊、許行、陶君、李健、白雲飛、駱秋雲、邱間壑等筆名，在報刊上發表。二十多年下來，積少成多，留下一大堆，現在擬將其中尚有翻閱價值的，分別編輯成書，用許行這個較常用的筆名將它們統一起來，稱爲《許行評論集》。計劃中想將這些文章分爲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和談文說藝的。現在先將有關經濟的列爲第一冊，取名《中國經濟改革的探索》。每篇題目下面均註明寫作的年月，以示時間的次序。

經濟改革，是目前中國的主要課題。它自鄧小平一九七七年七月復出起，尤其自一九七

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路線之後起，便已開始實行。七、八年來，改革的進度相當大，其中有些改革，如在農村中取消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隊，解散國營農場，普遍推行包產到戶承包制，如大力鼓吹引進外資，如在沿海若干城市建立經濟特區等等，這些措施，在七、八年之前簡直是不可想像的，現在都已付諸實施。一九七七年六月，我提出一個經濟改革芻議，其中雖已批判了毛澤東強迫農業集體化政策的錯誤，但仍不敢主張解散集體化農業組織，祇敢提出生產隊和人民公社民主化，以及農民有退社自由等主張。現在，中共的實際改革，已遠遠超過我當時所設想的，使得我當時的主張變成了明日黃花。若是硬將已經時過境遷的文章依年序編在本書之首，我想是不合時宜的，它會破壞整本書在題材上的現實感，所以我特地將七五年至七七年所寫的四篇有關經濟的文章放在附錄之中。說這四篇文章已經時過境遷，祇是就某種意義而言，事實上，我自認我當時對中國經濟病源的剖析，對鄧小平七五年流產改革的追懷，對四人幫在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上所發的濫言的批判，都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一九八五年八月五日

目錄

自序

.3.

改革經濟體制、加速中國現代化（一九七八年十月）	七
全民知經濟、專家辦經濟（一九八一年一月）	一七
包產到戶活躍了中國農村經濟（一九八一年六月）	二五
經濟改革勢在必行（一九八一年九月）	三〇
論中共的經濟改革（一九八三年二月）	四一
中國「耐普曼」的誕生與發展（一九八三年四月）	五五
個體經濟與企業改革的前景（一九八三年五月）	六五
中國渴望引進外資（一九八三年六月）	七八

特區經濟——資本主義運作的試驗場（一九八三年八月）	九〇
一九八三年的中國經濟（一九八四年一月）	一〇九
中國大敞開放之門（一九八四年四月）	一二五
改革與開放（一九八四年五月）	一三五
中國的改革往何處去？（一九八四年六月）	一四七
無形的手與無形的繩子（一九八四年七月）	一六六
新的突破（一九八四年十月）	一八〇
新改革引發新論調（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一九三
左右中國命運的無形力量（一九八五年一月）	二〇六
全官皆商與整黨（一九八五年三月）	二一九
怎樣看待不正之風？（一九八五年四月）	二三二
價格改革與通貨膨脹（一九八五年五月）	二四六
中國企業應該非國有化（一九八五年六月）	二六三
深圳的震盪（一九八五年七月）	二七三
海南島的一場黃金夢（一九八五年八月）	二九一
中國是「走社」還是「走資」？（一九八五年九月）	三〇四

附錄：

「資產風」與「官僚風」(一九七五年五月)……………	三二一
追談流產了的鄧小平改革(一九七六年九月)……………	三三三
從春節供應談中國經濟發展(一九七七年三月)……………	三四四
中國經濟改革芻議(一九七七年六月)……………	三六〇

改革經濟體制、加速中國現代化（一九七八年十月）

中國要現代化，這問題不是一個新問題，它早在李鴻章、張之洞時代便已提出了，祇是在過去，中國長期來外受列強壓迫，內受軍閥、官僚荼毒，遲遲未能實行。

中共的解放戰爭，推倒了「三座大山」，消除了帝國主義、買辦資本和封建地主對中國經濟的枷鎖，本可替中國現代化開闢新的道路，但是毛澤東的家長專制和盲動主義，却將中國經濟帶進另一個死胡同，以致從五八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起到文化大革命為止，簡直使得中國現代化的工作，箭折弓斷，元氣喪盡。

在中國經濟遭受毛澤東敗壞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曾兩次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口號，第一次在一九六四年底的第三屆人大上提出，第二次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第四屆人大上提出。可是這兩次口號，都先後受到當時的權力鬥爭的阻撓，以致胎死腹中，直至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垮了台，華國鋒才又重拾周恩來這個口號，作為自己新的號召旗幟，以鼓舞人心。但是真

正使「四個現代化」工作開步走的，還是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復出之後的事。

鄧小平的大胆措施

直到目前為止，鄧小平在「四個現代化」任務上，幹了好些大胆的措施。大致歸納如下：

教育改革——取消毛澤東晚年那套教育政策，恢復擇優取錄，扭轉了「讀書無用論」以及青少年的懶散風氣。

重用科技人才——制定科學發展規劃，召開科學會議，在各方面優待科學家，宣佈新的「紅專論」，鼓吹實事求是精神，以解除科學家的思想和政治顧慮。

改組企業管理——撤銷企業的革命委員會，實行一長制和責任制，調整工資，推行物質獎勵，甚至擴大計件工資範圍。

減輕政治框框箝制——宣佈毛澤東並非永不錯誤，摘掉右派帽子，落實華僑政策，以解除一般知識份子對政治框框的顧慮，並安撫海外華僑的不滿。

引進外國技術和資本——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購買外國整套設備，這在四人幫時期已進行，不過那時候是在掩掩飾飾的方式下進行，今天則公開承認中國落後，報導西方先進，鼓吹向先進學習，而且在這個基礎上，更大膽地引進外國技術。現已同日、美、英、法、德等

國的政府和財團廣泛接觸，期望同他們合作開發石油、煤炭，由他們來協助解決中國大企業、航運、鐵路等的技術問題和設備問題。並且已加速接受國外資本家的來料加工，鼓勵由他們提供原料、設備、技術和生產計劃，或者以彼此協作的方式在國內從事生產，或者以「補償貿易」的方式進行交換。據說，中共更考慮在天津或深圳劃出加區，讓外資進入境內直接投資生產。由於外匯短絀，前一個時期，中共已在外貿上變相接受外國財團的借款（由該等財團存款入中國銀行，作為中國向彼購貨之用），現在，他們已公開與外國私人銀行或財團談判借款，以及延期付款的貿易方式。

發展旅遊事業——擴大旅遊區，增加交通工具，加建酒店（已與香港華資集團協議在北京、上海、廣州投資興建酒店），提高國外旅客旅遊費用，作為吸收外匯的一大來源。

兩點重要觀念

中共上述一系列的新經濟措施，在國內外好些左傾人士中，已引起頗大的震動。他們開始懷疑，這類政策的取向，是否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呢？

毛澤東的幽靈正向某些人招手。這對華鄧政權是一個非常辣手的問題。鄧小平周圍的一批理論家，很想對毛澤東的思想來一次新的評價，尤其是毛澤東那些阻碍經濟新發展的舊論點。不批評這些舊論點，確難在新經濟政策的道路上甩開翅膀，引進更大膽的經濟措施。但是

那些文革派的孤臣遺老，因為在思想上長期受到毛澤東的培植，甩不開來，老是頑強地牽制着對毛澤東思想的批判。既然中央在目前情況下無法批判毛澤東思想，那麼毛澤東的幽靈，在一些慣於接受毛澤東極左思想的人士裡，自然要產生渺遠的回響。

但是經濟問題，自有它的客觀規律，不會長期屈服在主觀的思想框框底下。經過中共政權二十九年的經驗，經過全世界許多共產國家的長期經驗，我們起碼應該了解到以下兩點重要觀念：

第一，一個國家的經濟生活，是絕對具有國際性的。國與國之間不但需要互通有無，進行貿易，而且必定要發生技術交流，落後向先進學習。這是社會的必然現象，不是任何社會制度或革命言詞和反革命言詞所能阻隔的。新中國成立之後，因為美國的包圍和封鎖，曾使中國與外界的經濟接觸隔絕。同時，毛澤東在被包圍中所鼓吹的「紙老虎」思想，也無形中散發着一些義和拳式的排外心理和夜郎自大精神，使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接觸，幾乎陷於停頓。現在，舊的束縛解除了，新的接觸源頭開始，這是重返自然規律的事，沒有什麼不好。

或許有人會說，互通有無，落後向先進學習，固然不可避免，但總不該恢復「外國月亮才圓」的觀念。這是完全正確的。盲目崇洋同盲目排外同樣要不得。這就值得中國當局在採取新措施的時候特別注意的。我們長期生活在香港和海外，對西方的東西早有自己的價值觀，但是中國的一些領導人和廣大人民，在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封閉和反宣傳的環境之後，一旦睜開眼睛接觸到西方，那種土包子進城的洋相，倒確乎值得警惕。

第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它處於建設初創時期，其經濟體制，決不可能純粹是社會主義模式的。越是經濟落後的國家，越要用較長的時間在相當範圍內保留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模式，特別是在小生產企業和小農經濟範圍，尤其如此。

違反這個規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往往要招致巨大損失。俄國十月革命後的軍事共產主義，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實行的農業全面集體化，以及毛澤東的五七年人民公社，都是違反這一規律的最顯著例子。

列寧畢竟和斯大林、毛澤東不同，他能迅速認識到軍事共產主義的錯誤，立即加以糾正，改採新經濟政策，使俄國經濟從軍事共產主義的大破壞中復甦過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就是對資本主義讓步的一個大膽措施。它不僅恢復市場交換來活躍死滯的經濟，甚至提出租賃制，允許外國資本在俄國投資設廠、開礦。這與中國今日的新措施，基本上是相同的。

如果我們明白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就不會對中共今日的新措施感到迷茫，反會慨嘆它踟躕來遲。中國若早於五十年代就實行這類措施，以代替毛澤東的盲目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中國便不至於虛擲二十多年光陰，落得今天這般經濟落後。

應該引進工人自治制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中共今天的新經濟措施，例如技術引進、物質獎勵等，固然可以在

某種程度上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又例如資本引進和旅遊事業的發展，固然可以挹注原始資本累積的短絀，但是所有這些措施，都祇不過是減輕中國經濟發展的某些急迫的壓力，還不是促使中國經濟從根本上起飛，奔向現代化的步驟。

阻碍中國經濟起飛有兩個因素：一個是科技落後，這是有關生產力方面的；另一個就是目前的經濟體制，根本缺乏主動性的活力，這是有關生產關係方面的。科技的落後，可以在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情形下，逐步獲得改善，但若中國經濟體制不從根本上來一個改造，那末所引進的先進技術，將會受到呆滯的經濟體制牽制，停留在某些技術點上，而不能廣泛地帶動整個社會經濟飛躍地活動起來。

中國現行經濟體制為什麼會缺乏主動性的活力？這因為國家對企業卡得太死，而國家本身又是那麼中央集權，高不可攀，以致使得企業單位完全失去自主權和主動性，企業工人不僅沒有當家作主，反而淪為比在資本主義社會還不如的廉價僱傭勞動，所以生產情緒低落，無心於企業。

這種經濟體制，絕對不應再持續下去。它的持續，祇有阻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怎樣改變體制？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中共黨內經濟專家和某些實際負責人的注意。目前擺在他們面前，有兩個具體實例：一個是南斯拉夫的實例，一個是羅馬尼亞的實例。

南斯拉夫的體制，完全是一種自治體制。在企業單位裡，它實行工人自治；也就是說，各個企業單位，都由工人選舉出來的工人委員會來管理。工人委員會有權任免廠長和經理，